

杨晓塘 主编

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编

程朱

思想新论



人
民
出
版
社

杨晓塘 主编

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编

程朱思想新论

编委会 李 準 李学勤
赵金昭 焦金山
郭齐家 王兴堂
杨晓塘 张 铭
张京华 白兴华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赵迎珂

责任校对:严呈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朱思想新论/杨晓塘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

ISBN 7-01-003039-1

I. 程…

II. 杨…

III. 程朱学派-哲学思想-研究-文集

IV. B244.6

程朱思想新论

CHENGZHU SIXIANG XINLUN

杨晓塘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3.375

字数:32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 7-01-003039-1/B·247 定价:20.80 元

今日文化是昨日文化之 延续(代序)

赵金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一直是主流。北宋以降所确定的以理学为核心的新儒学,在传统儒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开创性的理论体系,作为上层社会的主导思想,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束。辛亥革命之后,由于理学在政治上的负面作用,包括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在内,长期被当作大地主阶级的理论代表和唯心主义的哲学典型而屡遭讨伐,以至于程朱思想的研究十分薄弱,缺少大胆的深层次的开掘。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的思想运动和文化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促使我们对程朱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切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评价和确认。九百年后的今天,中外文化界的专家和学者聚首古都洛阳来纪念他们、研究他们,这便足以证明程朱的学问和人格,有着一一种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感召力。由程朱思想在新时期的再生这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颇能引起我们的诸多反思,其中一个带本质性的问题,便是今日文化与昨日文化之间的关系。

传统文化要不要继承,这是一个伪命题。中外的文化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的今日文化都是这个民族昨日文化的必然延

续,文化的历史伸展是不能割裂的。质言之,一个民族都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的定义是千差万别的,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答案,各个定义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钱穆先生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生活,是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生活的总括汇合。钱先生特别指出:“但此所谓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并不专指一时性的平铺而言,必将长时间的绵延性加进去。譬如一个人的生活,加进长时间的绵延,那就是生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中国文化史导论》)对钱先生的这段话,我们只能作这样的理解:共时性的各种各样的生活,还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只有加进动态的绵延性,才可称作是带引号的文化。钱先生定绵延性为文化的特质,此论深中肯綮。

既然绵延性是文化的一个特质,那么这种历史绵延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我认为,这种历史的绵延是人类社会自然造成的,并非人为的。或者说,如人种的延续依靠遗传因子,文化的延续也要靠文化的基因。每个民族一旦成为一个文化群体,他们便具有了某种共同的文化基因。举例说,汉语汉字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便是其文化基因链环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试想,如果真的用拉丁字母将汉语汉字取代,中国文化将是怎样一种面目呢?那是不可想象的。埃及与巴比伦文明的消逝,与二者古文字的消逝是密切相关的。又如,以祖宗崇拜相关的中国的‘孝’文化,是与西方的伦理方式迥然不同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孝’文化会不会彻底消失?会不会彻底改变?我认为,衍化为尊老爱幼的孝文化,在中国不但不会消失,还会被越来越老龄化的人类社会所广泛接受。再如“天人合一”的古代思想,有人从西方哲学的观点出发,以为是

一种“无我”的混沌观念,是人类低级思维的产物。事实证明,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与自然对立所导致的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的现代价值。文化既然是一种“生命”现象,它的绵延必然含有自然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说,传统文化要不要继承,实际上就是一个伪命题。

文化的这种绵延性特质,显示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当今,就文化生命力而言,能与中国文化相比较的,只有欧洲文化了。然而,这两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它的绵延方式却有着两种不同的形态。欧洲文化从希腊开始,接着是罗马,接着是北方蛮族,主角不断更换。中国文化,自从远古以来,历经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各代,唱主角的都是中国人,秦、汉、隋、唐各朝,直到宋、元、明、清各代,主角都还是中国人。正如钱穆先生所作的比喻,欧洲人进行的是一场接力赛,一面旗帜从一个人依次传递给另一个人;中国人进行的是一场长跑,从头到尾都是由一个人跑下来。显而易见,这两种文化所表现出的绵延性就有着不同的形态。一般说,在纯粹与杂合、保全与创新、封闭与开放等等诸方面都表现出泾渭分明的特征。

文化的绵延性是就文化的内在的历史联系而言,这当然不排斥文化发展过程所呈现的多姿多彩,即文化的丰富性或多样化。正如,树木根茎是相连的,但根、茎、叶、花、果是一体树木上的不同形态。作为轴心时代的先秦文化是与汉唐文化不同的;隆盛时期的汉唐文化又与明清文化不同;风雨飘摇的明清文化又与当今的文化不同。尽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但深究起来,它们都是有着共同的基础。说的确切一点,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是以中国六七千年来缓慢发展的封建文化为前提的;孔夫子与毛泽东的文化血缘,是无论如何也割不断的。

1939年,毛泽东看完当时陈伯达的文章《孔子的哲学》的手稿,就立即写信给宣传部长张闻天,谈了自己对孔子思想的想法。毛泽东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观念哲学有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谈到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个典型论题,毛泽东认为“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的意思差不多。但如果在‘名不正’上面加上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毛泽东书信选集》)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还从方法论上肯定了孔子的“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认为它阐明了事物质的量的规定性。

我们强调文化的绵延性,并不是提倡文化的保守主义。“文化的自然发展”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这既是两个对立的命题,又是两个统一的命题。石器文化变为青铜文化,进而铁器文化,进而机械文化,进而电子文化,这显示了文化的生命力(即绵延性),也显示了不同时代文化的质地(即多样性)。如果有人否认它们之间循序渐进的内在联系,那是错误的,但如果有人一定要人类从电子时代回到石器时代,那同样是荒唐可笑的。文化的绵延性是文化的可继承性的内在根据。然而,电子时代的人们不可能把石器时代的文化全部继承下来。文化要不要继承是一个伪命题,但文化继承的选择性却是一个真命题。过去时代的文化,可以分作有生命力和死亡的两部分,我们自然要继承的是那些有生命力的文化。那么,什么是有生命力的文化呢?我以为还是毛泽东提出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标准较为确切,也较易实行。

今天,中韩学者会聚一起,对程朱思想加以新的审视,这便是一种选择性的继承。这种选择的目光有古代的一面,也有当代的一面。阐明程朱思想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开掘程朱思想在现代社

会的价值,这是我们的宗旨。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过激主义都应从我们身边走开。

(作者系洛阳大学党委书记)

1999年3月

目 录

今日文化是昨日文化之延续(代序)	赵金昭(1)
程朱思想的时代精神	张立文(1)
论二程的教育思想	郭齐家(9)
程朱理学与李氏朝鲜坚守“感戴皇明”	杨荣垓 杨效雷(25)
孔孟的仁和程朱的仁说	赵骏河(42)
洛学与高丽的孔孟儒学	刘明钟(57)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王殿卿(66)
二程洛学的佛、道观	卢连章(85)
韩国程朱礼学之成立与其展开	裴相贤(100)
在对《周易》解释的变迁史中程子《易传》之意义	金弼洙(107)
二程、朱熹对中国儒学的发展	蔡方鹿(113)
中州洛学传人对师说的继承和超越	卢广森(128)
展望程朱理学与东亚细亚哲学的前景	柳仁熙(151)
濂洛风诗的特性	宋寓镐(168)
朱熹人才思想述论	程有为(175)
程颢、程颐的自然知识及其科学理性	徐仪明(184)
评朱熹“《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样”的	
《易》学思想	李之鉴(193)
王弼与程颐的体用论比较	金周昌(208)

在韩国伊川易学思想之展开	金益洙(215)
略论程朱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之借鉴	金其桢(220)
程朱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张品端(233)
二程的哲学观点及教育思想概说	孟令俊(241)
庄子和程颢的生命理境比较	李宣侑(253)
伊川之易学和理学的相关性	赵壮衍(264)
二程生日考	程德祥(275)
朱子道家(道教)观与佛学(佛教)观简述	张京华(282)
论象山心学的“先立乎其大者”	彭永捷(298)
论二程的改革主张和求实精神	张留见(314)
试论朱熹的理学与其教育思想	朱平平(322)
论二程的人格教育思想	沈 平(337)
黄宗羲对理学的继承与批判	李馥明 陈丽 庞凤芝(348)
附录一:二程佚事及传说	程德祥(356)
附录二:近百年二程研究专著、论文索引	杨晓塘辑(386)

程朱思想的时代精神

张立文

我研究朱熹思想 35 年有余,其间有神交的愉悦,有遭害的悲愤,亦有闪光的启迪,有精神的激励。这是我之所以持续不断和朱熹思想结缘的原因所在。

由于程朱思想体现了历史的脉搏、时代的精神,因此,他的思想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影响久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成功地回应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挑战,并化解了各层面的冲突。这些冲突和挑战表现为:

一是价值理想的挑战。唐末的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以及五代十国的长期混战,造成了社会长期动乱和分裂,致使伦常破坏,道德沦丧,理想失落,精神迷惑。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凝聚力,宋代道学家必须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二程朱熹所建构的“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形上学的哲学逻辑结构,担当起重整和重建的责任,并较切实地化解了这一挑战。

二是外来文明的挑战。自汉以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发生激烈冲突,虽有“三武灭佛”运动,但不能从思想上清除佛教信仰。佛教思辨的哲学较之儒教精致。同时道教在吸取佛教思想中,亦使其宇宙化生理论更为完善,而出现儒衰佛盛的状况。作为官方意识形

态的儒教受到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的挑战。如何把儒、释、道三教思想在冲突中融合起来？以达到“一道德”的需要，是当时学术思想所追求的。从隋唐提出对三教实行兼容并蓄的政策以来，一直延续到宋初，并没有把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起来。虽然宋初的孙复、李觏等继承韩愈的批佛、道，兴儒学的精神，指出佛存有十害，去佛有十利主张，但既不能去佛，又不能去害。程颢提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二字虽古有之，然“自家体贴出来”是指创造了融儒、释、道三教为一的理学体系，开创了理学的时代，并把兼容并蓄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的方法落实到了实处，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做出了成功的回应。中国传统文化在融合儒、释、道三教文化中，不仅达到了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高峰，而且超越国界，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并在与传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中，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由张载、二程奠基的理学，由朱熹集大成，使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更加完善起来。此后三教的冲突在思想哲学领域就不如唐和宋初激烈了。

三是理论形态转型的挑战。宋代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三大发明的完善，促进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城镇商品市场的发达，酝酿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但这个转型受到传统经学的挑战，并与汉唐经学发生严重冲突。汉儒治经，偏重注解，名物训诂。唐儒治经，上承汉儒，依汉注作疏。《五经正义》以“疏不破注”为原则。末流所及，以致“诤言服、郑非”的情境。不仅以“疑经”为背道，而且以“破注”为非法，严重桎梏、束缚着思想界。宋儒起来大破汉唐“传注”，打破疑经、破注的禁锢，不仅“舍传求经”，而且“疑以改经”松动了压在思想上的重重大山，实行了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如程颐的《程氏易传》。朱熹以《周易》为卜筮之书，《诗经》讲男女之事，《尚书》为历史文献记录等等，扫除了《五经》为圣人之言的种种光环和权威，

实现了思想解放,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罕见的各家异说、学派众多、竞彩斗艳的繁荣格局,才使隋唐儒、释、道三家之学向宋明理学的理论形态转型。

宋明理学在回应、化解上述三方面的挑战和冲突中,乃显示了其中生命智慧和活力。西方学者曾将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New - Confucianism),有其道理。跟元典儒学和汉唐经学儒学相对照,宋明理学确有新的特点、新的精神。宋明理学之所以为新儒学,是指其在外来印度佛教文化哲学与本土道教文化哲学以及价值理想、理论形态转型的挑战下,将元典儒学作为滞留于伦理道德层次和心性之学,从形上学本体论层次给以关照,使传统儒学以心性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理想(包括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建构在具有理性力度的形上学本体论思维之上,通过诠释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的联接以及人与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的关系,使儒家道德学说获得形上性和整体性的阐发,传统儒学内部的逻辑结构、价值结构、道德结构等经此调整,获得了新的生命。

宋明理学新儒学之新,是通过一系列活的、有重要文化历史价值的学术精神充分而生动地呈现出来的;宋明理学的精神,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整体体现,程朱思想无疑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

其一,求理精神。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具有理性主义特性。宋明理学最切近的学术目标,是要“格物穷理”。这个理既是形上学本体,是普遍的存有根据,也是最深层的价值源泉。程朱理学是一种寻根究底的理性主义哲学,求理精神是其最基本的学术精神。这种求理精神是两宋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和民族时代精神的显著标志。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核心,以及由这种生存方式和文化核心所转化的自觉生存智慧和价值观念。在程朱的思想观念中,理是事物之“所以然”和行为之“所当

然”的和合体,是先验的价值原则和经验的条理秩序的统摄融贯。对此理的“格致”和穷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从事德行实践,通过道德主体的自觉操持,实现万物存有的价值及人生的意义。他们把理的精神和原则推及一切领域,自然、社会和人生都被召唤到理的天秤下,被追究其“所以然”与“所当然”,被判断为合理抑或不合理,以至被决定其存在与否的命运,使儒学理性精神发展到一个极限,体现了理学的根本特征。

胡适曾说,朱子的学说有两个方面:这就是“程子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主敬的方面是沿袭着道家养神及佛家明心的路子下来的,是完全向内的工夫。致知的方面是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科学家穷理精神,这真是程朱一派的特别贡献”。此说有其道理。涵养重“尊德性”,进学重“道问学”,是二而一的两种功夫。穷理精神可转换为现代对科学的追根究底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求理精神。

其二,主体精神。它是以中华民族现实生存为根基的文化群体的主体精神。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心的是文化“道统”的生生不息,向往的是“廓然大公”的人人圣贤的至德之境。理学家借助理欲、心性、理气等对偶范畴的精致辨析,将人的道德存在、伦理特性和价值尊严提升到了宇宙本体的形上学高度,视人为天地万物的价值主体,抽象地证实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儒学信念。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宗法社会。人们必须按照天地变化、四时运行的自然法则制定节气,依据节气安排耕作活动。自然环境的变化,既带来风调雨顺的丰收喜悦,使人普天同庆,又可导致干旱水涝等大面积的灾害,让人万众齐哀。怎样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天人合一状态,成了传统文化哲学的首要课题。与此同时,如何协调人伦关系,规范宗法秩序,强化群体意识,提高

群体智慧和力量以对付各种灾害,达成人人和谐统一,也成为传统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宋明理学的主体精神,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这一生存环境及文化价值之中。程朱以天下为己心的情怀,正是理学文化主体精神的体现。

其三,忧患精神。程朱忧患精神是指人处于忧患境遇时,对人性的伟大与尊严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意义及价值的深刻体验,并力争通过人自身的生命力量超越忧患境遇,达到真、善、美高度统一的文化心态。宋初面对唐末五代的情境,道德文化与学术思想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建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重新确立儒家伦理和道德原则。程朱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无限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以及由自我心灵发出的无限的爱人及物、由己及人的悲愿,同时对于未来社会亦充满忧患,从而把自我美好愿望提升为现实的社会理想。

自觉而深沉的忧患精神,煎熬与锤炼了程朱的思想意识,驱使它不断超越所处的时代,从形上学本体论的思维高度反思人伦的存在价值,文化的生命意蕴和道德永恒力量,促使其打破学术的派别门户之见,出入佛老,游思空无,综罗百代,融合三教。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显示出崭新的形上姿态。

其四,力行精神。它是程朱人世的品格和刚健精神的凸显,是其投身现实社会,奋发进取,追求自己理想价值的实现的精神的体现。程朱既强调知的先行性,主张“知先行后”,又重行的重要性,坚持“行重知轻”。只要沿着“格物穷理”的格致路线走下去,就必定能达到知性一如的德行境地。这无疑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渐修之路,须要“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持续积累,才能“脱然自有贯通处”。但随着程朱理学的官文化,理学末流视理学为猎取功名利

禄的工具,便失去了程朱“格物穷理”的力行精神。

其五,求实精神。程朱理学始终以批判佛教之空、道教之虚、老庄之无为为其治学的学术宗旨。程朱曾反复申明:“释氏虚,吾儒学”。“要之佛氏偏处只是其理,理是实理,他却虚了,故于大本不立也”。他讲实学,求实功,针砭时弊,颇有建树。学术因教条化而流于空谈,是学术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蜕变倾向,实非程朱理学所独有。其实,区分学术思想空谈与实用的标准,不能是简单而直接的功利效果。从表现形式上看,任何理论性学术研究和思想争论都有务虚的,似乎是无实无用的空谈。但是学术思想的实,是反映客观现实的理论之实;学术争论之用,是推动思维发展的逻辑之用。因而,程朱理学有其谈论心性,辨析义理,旨在重建社会道德价值理想和伦理生活秩序,从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实学和有逻辑概括性的实理的一面。其实,不仅“实理”范畴是由程朱等首先阐明的,而且“实学”这一概念的理论涵义,也是由程朱等反复倡导的。实学就是没有“议论辞说之累”的学问,即实实在在的学问,也即是“道明”之学。讲实学,求实理,是贯彻于理学思潮始终的求实精神的体现。

其六,道德精神。重伦理、尚德行,是程朱理学道德精神的重要特征。相对于倏忽即逝的现象,程朱更注重恒常不变的本质。他用理来说明物之为物、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和终极原因,并论证人的心性本体以及道德价值的形上性的永恒性。在功利与理想、利益与公德、公与私的冲突中,拔高理想、道德和公的地位,主张以公灭私,以理统欲。他们将儒家仁、智、信等道德规范抽象化、本体化,使其成为“颠扑不破”的价值原则,同时,又依据这些理想化的原则处理实际的人伦关系,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准则。这一主张,有禁欲色彩。但若将其视为完全禁欲主义而加以否定,又过于偏颇。这里需要弄清:理欲之间怎样划界?存理灭欲的实

际所为何？朱熹曾以饮食之例，说明理欲分际：“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可见，朱熹并不一概否定饮食男女之类的生理基本需要，存理灭欲的实际所指是奢侈无度的少数官吏。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现事与愿违的背反。理欲之辨的初衷是想规谏统治者，使人主心术端正，以利社会和谐和道德教化，但事实上却被统治者顺手接过来，使理欲之辨由道德修养性的圣贤功夫转化成了政治奴役性残杀工具。

程朱的道德精神是具有形上学品格的道德精神，只要重建了儒家伦理价值体系，就能从心性这一根本上匡正唐末五代以来的道德沧桑情境，使社会伦理复归于三代“天理流行”的至善境界。

其七，开放精神。程朱哲学不仅敞开心胸，吸收儒、释、道各家之长，为我所用。如佛老思想中有价值的理论学说、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图式，表现出极大的兼容心态和开放精神。他既能“综罗百代”之学术，无开放精神是根本不能“综罗”的。正因为他有开放精神，所以能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随着历史的发展，程朱思想所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业已消失，其具体学术主张和思想观点也多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蕴涵在这一思潮中的求理、求实、主体、忧患、力行、道德、开放等活生生的学术精神，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民族文化的传统之中，生长在民族心理的结构之上。程朱道学和宋明理学所体现的这些精神，若与中国现实国情与世界发展趋势相结合，对其进行体认和创新是意义深远的学术文化使命。

程朱思想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如何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应如何解释？笔者认为，所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的转生问题，而不是某种文化形态（如儒家的现代化，道家的现代化，或接着宋明理学讲等）或静态的传统文化（生成物）在现代是否有存在价值的问题。文化精神的转生，就是与现代